

启真学术文库

QIZHEN

蒋竹山 著

人参帝国

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启真学术文库

QIZHENG ACADEMIC SERIES

人参帝国

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

蒋竹山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蒋竹山
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3
ISBN 978-7-308-14292-2

I. ①人… II. ①蒋… III. ①人参—历史—研究—中
国—清代 IV. ①S5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1522号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2014-274号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作者授权出版

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
蒋竹山 著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王 雪
营销编辑 李嘉慧
装帧设计 骆 兰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38千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292-2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0571) 88925591；<http://zjdxcs.tmall.com>

人参帝国

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

“启真学术文库”学术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主 任

罗卫东

委 员

丁 宁	李伯重	李剑鸣	梁治平	刘北成
龙登高	渠敬东	苏基朗	韦 森	杨国荣 赵鼎新

丛书策划

王志毅



启真馆出品

序

得悉台湾学者蒋竹山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将首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深感欣悦，这其实也是我几年前就有的意愿，因为我觉得将这本直接与国际史学前沿对话的医疗史著作，放在大陆的学术语境中，或许更能发挥其引介和推动西方史学潮流的作用。医疗史和新文化史等研究，在台湾史学界，或早已在主流史学中占据了毋庸置疑的地位，不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频繁地出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新史学》等一些重要的刊物上，相关的新理念和方法往往也渗透于众多的具体研究成果之中。不过在大陆，医疗史的研究虽然兴起也已有些年头，但其合法性似乎仍还不是毫无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项新兴而小众的研究，虽然也吸引了一些研究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然而其中很多的研究并没能彰显出新兴研究的新气象，“新瓶装旧酒”的现象还颇为严重。笔者在最近一篇有关国内医疗史研究的综论性文章中指出：“当前国内史学界的医疗史研究，总体上对国际主流学术成果的了解、把握还远远不够，往往缺乏国际上比较主流的学术认知和问题意识，未能将自己的研究置于国际学术发展的脉络中来展开，以旧理念、旧方法探讨新问题的情况比较常见。作为一个

新兴的前沿研究领域，虽然被视为当今‘新史学’的一分子，但在践行和引领‘新史学，发展上，尚难尽人意，其所展现出来的新意涵、新气象还远远不够。”^[1]

要想让新的研究展现出新意涵和新气象，虽然不是简单地倡导与国际接轨就可以达成的，但毋庸置疑的是，西方世界的学术研究，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整体上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而言，食洋不化，盲目照搬照套而不接地气，固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升中国的学术水准。不过，追求自主和本体，大体是人类的本性，在一个充分开放的学术环境中，食洋不化虽然可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像一味拒斥外来思想一样，但绝不会成为基调。因此，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特别是新兴研究中，了解和借鉴西方践行有年、相对成熟理念和方法，自有其必要。如果我们简单地将西方的相对经典的理念和方法视为抽象甚或空洞的理论（实际上那些被视为理论的研究多为具有实证性的研究），高举“中国特色（气派或风格）”的大旗而有意无意地忽略或加以拒斥性的批判，说到底，其实就是对人类智慧和文明结晶的自我隔绝。

尽管理念和方法对一项研究的深度和水准并不一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理念和方法的更新对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回想笔者十多年前撰著博士论文时，眼界和学术资讯等方面的限制，让自己的研究在基本认知和分析深度乃至资料搜集等问题上均留下了不少遗憾^[2]。如果当年，中文学界有对西方重要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相对成熟理念和方法有比较系统的引介，笔者亦拥有较好的获取资讯的条件，想必一定可以弥补其中的一些遗憾。如今，国内学术界获取国际学术资讯的条件早已今非昔比，年轻的学

[1] 余新忠：《问题与前景：当今中国医疗史研究蠡探》，待刊稿。

[2] 相关的反省请参阅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再版序言》（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9页。

人似乎也有了更好的外语能力，从理论上说，了解国际学术的前沿动态，最好的办法自然是直接阅读外文文献，但外文文献浩如烟海，如何入手，实在是个问题，而且外文文献的获取和把握理解很多情况下也并非轻而易举，故而对于整个国内史学界而言，先行者精当的引介和评论仍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当今国内众多的学术刊物，在国内外的新书评介方面，还做得颇不如人意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近一二十年来，蒋竹山博士在引介西方前沿学术思潮和论著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在我的印象中，至少在两岸的中国史学界，似乎还很少有人能出其右。或许自己与他的兴趣点比较接近，我在具体的研究中，也常常从他引介的资讯和评论中获益良多。两年多前，他出版了集中体现其这方面工作的著作《当代史学研究的趋势、方法与实践：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大陆的张仲民博士在书评中首先指出，他“是这些年向中文世界介绍新文化史的一位重要推手，特别是他架设的‘新文化史工作坊’网站及‘新文化史部落格’，引起众多读者对新文化史的兴趣，甚或还吸引不少人投入到新文化史研究的阵营中”^[1]。蒋博士推介的，显然并不仅仅限于新文化史，近些年来，除新文化史外，有关在西方比较兴盛的医疗史、全球史、物质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等，他均有不少的推介和评论。当然，他基本的研究兴趣在医疗史，所以在推介和评论其他新兴前沿研究时，似乎往往都或明或暗地与医疗史相关联。所以我总觉得，国内的医疗史研究，要展现出新气象，要在充分借鉴西方现有重要研究成果和相对成熟的理念和方法的基础上向前发展，蒋博士所做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业内的人都会知道，做这样一些工作，是十分耗费时间和精力

[1] 张仲民：《从新文化史到全球——评蒋竹山著〈当代史学研究的趋势、方法与实践：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载《文汇报读书周报》2014年1月10日，第10版。

的，而对于专业上具体的实证研究来说，要想做得深入，最重要的可能是要有比较完整的时间去做系统而全面的史料搜集和深入而细致的思考，蒋博士在引介评论方面做了如此多的工作，再加上他作为大学老师，必然还有大量的教学任务，所以我偶尔也会担心，这会不会影响到他具体的专题研究，会不会让他众多很有价值的思考和理念停留在推荐上，而没有时间和精力将其贯穿于自己具体的研究之中。如今看来，我的担心应该是多余的。

人参在当今华人中的人气，及其在保健方面的神奇性，毋庸多言，或许称凡有华人处，便有人参之踪影，亦不为过。人参这样的影响力无疑是渊源有自，而非当代才有。人参自有功效，但能获得如此的青睐，在华人的保健中拥有如此神奇的地位，显然也不是其本身所具有的功效所能完全解释的，肯定还离不开文化上的建构。人参既是药品，同时也是保健品，更是日常的消费品。它的影响也不仅仅局限于中国，还行销于日韩等东亚世界。不用说，一部人参的历史，不仅关乎中国的医疗史，同时也与饮食文化、消费文化、物质文化、国际交流乃至整体的社会文化变迁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当看到蒋博士的这一选题时，我第一个感受便是，他极具慧眼地选择了一个极富意义和趣味且深具开掘深度的好题目。他能够在十多年前就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来做，令笔者深感羡慕和钦佩。我想，这肯定不是偶然，除了有名师的指点外，更重要应该还缘于他开阔的学术眼界和出色的学术敏感性。

正因为他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所以展卷读来，对于很多读者尤其是大陆学术语境中的读者来说，很可能会有新意扑面而来之感。作者在一开始就借用清人的论述告诉我们，今日以东北人参（辽参）为正宗和上品的观念其实始于清代，此前则多以山西上党人参为优，这一有关人参产地认识的变化，既有生态环境变化的因素，也与东北乃清代统治者龙兴之地这一历史事实有关，政治、文化和生态的演变对于人参历史的影响呼之欲出。而后，他又通过对学术史的回

顾和思考，点出了当前相关研究的不足，总体上“多偏向制度的社会史，少有文化史的取向”。具体而言，较偏重人参采掘的探讨，较少触及其流通和消费，未能将医药史和制度结合起来考察，忽略了人参作为一种商品的特性，没有将人参的消费与江南的温补文化相关联，也没能关注相关医书（主要是本草类著作）特别是人参专书的考察，等等。并希望将自己的研究置于医疗史、知识史、物质文化史、消费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全球史的学术脉络中来展开，并进而探究近代以前医疗史发展的状貌及近代医疗“近代性”的意义，这些都是当今医疗史乃至历史学研究中的前沿议题，这样的梳理和探讨具有新意和启发性，是显而易见的。

蒋博士显然不愿让自己多年积累起来的具有前沿性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理念停留在单纯的评介类文章的书写上，而希望能将其融汇在具体的研究中，通过实证性的研究来实践其新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同时也彰显其作为“新史学”的新意和价值。而目前这一选题也给了他很好的实践机会，他颇有条理地将这些议题和问题意识分散在后面不同章节中来加以处理。通过对唐宋以来特别是清代有关人参文献的考察来梳理人参这一“物”的知识史，通过比较细致地钩沉和探究明末以来东北人参的采挖、收集和专卖等制度的建立和演变及其过程中不断涌现的弊端与应对等，来考察政局和时代的变迁，试图通过对明清江南温补文化的探讨来解释清代社会对人参的大量消费，进而通过人参消费的考察，来呈现人参在清人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及其社会文化意义，以及有关人参的新文本、新知识的产生。毫无疑问，蒋博士的研究，不仅让我们比较系统地了解了清代社会有关人参的知识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基本状貌，还进一步提示我们，人参虽小，事体却大，人参虽只是众多药物中一味，却牵涉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可谓是“袖里乾坤”。从而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史学研究中“以小见大”的良好例证。

不过另一方面，既然人参关涉社会的方方面面，那有关人参的信息必然会散落中清代文献的角角落落，这无疑就使我们希冀比较系统全面地搜集人参的资料变得十分困难。蒋博士虽然在资料的搜集上也颇下了一番功夫，比如有关档案资料的挖掘和日韩人参专书的利用，多有新意，但整体上其资料的搜集在全面系统性上无疑还有不小进展的空间。与此同时，蒋著目前的书写，让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其问题意识以及学术意图，固然有利于彰显该著的新理念、新方法，以及激发读者新思维，但多少也会给人以“以论带史”的意味，让人觉得其书写的重心更多只是史学理念的实践而非历史经验的呈现。拜读完大作，笔者总在想，如果作者在具体的研究中，能暂时抑制自己强烈的问题意识，而更多地致力于资料的全面系统的搜集和深入细致的梳爬，在全面把握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料解读利用来体现其问题意识和学术理念，那清代人参史的书写必然会更加的丰满和细腻。

要在一项研究中处理好如此多新颖而复杂的议题，显然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蒋博士业已作出了很多也很好的努力，为人参史乃至药物史的研究拓展了新的研究视角，奠定了一个不错的基础。毫无疑问，人参史这片学术沃土还远没有开掘殆尽，蒋著更重要的意义或许还在于将有助于激发研究者更多地参与到人参乃是药物史的研究中来。蒋博士是我熟识多年的益友，在日常的交往中，他让我获得了很多学术上的启益。在其大作即将梓行之际，谨此写下一点心得体会，以志祝贺和推介。希望也相信该著的出版，将会激发更多国内史学界的青年才俊进一步以新理念和新方法来探究历史上的人参、药物乃至疾病与医疗。

余新忠

2015年1月5日于天津寓所

目 录

第一章 植物、医学知识与消费文化： 人参史研究的新方向/1

第一节 人参政治的研究回顾 /3

第二节 从制度的社会史到消费文化史 /16

第二章 分类：人参文本与书写/25

第一节 清以前人参的物种生命史 /26

第二节 清代人参的类别 /33

第三章 边境：明末清初东亚边界的人参问题/51

第一节 边境社会的人参冲突 /53

第二节 皇室的专职采参组织：打牲乌拉 /58

第三节 八旗与人参：旗办采参制 /66

第四章 人参政治：专卖与官参局/81

第一节 雍正时的采参制 /83

第二节 延续还是断裂：

乾隆初期的招商采制（1736—1743）/91

第三节 国家直接管理：官参局的设立 /99

第四节 参务管理的困境：

乾隆五十九年的吉林参务案 /104

第五章 真伪：秧参与参务案/114

第一节 参禁制度下的变奏：秧参的崛起 /116

第二节 国家权力与秧参：参务案的爆发 /121

第三节 中央与地方的角力：参务章程的论争 /139

第四节 人参专采的取消：

从道光朝到光绪朝的转变 /143

第六章 医药：江南的温补文化/148

第一节 “不怕病死，只怕虚死”：

清代江南的好服补药风气 /149

第二节 明清的人参药用与医者论参 /158

第七章 消费：人参的价格、贸易与流通/170

第一节 “中人十家产，不满一杯味”：

人参价格的变化 /172

- 第二节 参斤变价：清代东北官参下江南 /180
- 第三节 商参的流通 /204
- 第四节 新知识、新消费：人参消费的指南书籍 /213
- 第五节 礼物文化：人参的赏赐与赠礼 /234

第八章 结论：从人参史反思全球视野下的医疗史研究/238

- 第一节 全球视野下的人参帝国 /238
- 第二节 全球视野下的医疗史 /242
- 第三节 药物流通的全球史 /246
- 第四节 疾病、环境与医疗的全球史 /248

参考文献/261

索引/281

第一章 植物、医学知识与消费文化： 人参史研究的新方向

引 言

清末一位上海医者毛祥麟曾对清代人参的历史，有相当详细的描述。^[1]在这篇笔记中，他透露了几个现象：第一，党参不同于上党人参，两者是不同品种的植物。清以前中国的人参大多产于山西太行山一带的上党，其质性优于百济的高丽参。明代本草学家李时珍编《本草纲目》时，尚未细分出人参和党参的差别，直到清代吴仪洛的《本草从新》，才将党参独列为一类。吴仪洛对“党参”的描述是“今真党参久已难得，肆中所卖党参，种类甚多，皆不堪用”^[2]，此处的“真党参”指的应是清以前的“上党人参”。到了清代，由于上党人参几乎灭绝，人参市场才出现和人参不同科的党参。第二，明代辽参的知名度不高，直到清入关之后，它的价值才受到重视。第三，清代的辽参原以宁古塔为主，后来为船厂和凤凰城取代。凤凰城的人参因质嫩

[1]（清）毛祥麟：《对山医话》，收入沈洪瑞、梁秀清编：《中国历代名医医话大观》，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1222页。

[2]（清）吴仪洛：《本草从新》，乾隆二十二年跋（1757），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页。

糖重，价格低，使得人们对人参外观的喜好由“光圆熟”转为“糙熟”。第四，康熙末到乾隆年间，人参价格增长十几倍。第五，质量较佳的人参愈来愈少，伪参充斥市场，使得一般医家更难辨别人参品种的好坏。

清朝是唯一将人参作为重要商品来专卖的朝代。透过人参的研究，我们看到许多与人参有关的现象，这些因人参而出现的政治制度、商业行为、法律措施或消费文化，成为帝国发展特色，我们或许可称之为“人参帝国”。例如清朝与朝鲜的朝贡贸易、东北的封禁与人参开采、参局的设立、清政府的参票发放与官参缴纳、榷关征收人参税、旗籍刨夫的管理、王公大臣的赏赐、官员的参务考核、内务府的参斤变价等。这些看似传统史学研究中属于制度史的课题，借由新材料的发现以及新观念的运用，我们可以开展出以往学者未曾探讨的课题。例如以往的人参史研究大多是从清代官方档案来看参务制度，缺乏物质文化的视野。^[1]也未曾有人探讨过人参为何大多是贩售到江南，这与当地盛行的温补文化是否有所关联？此外，人参不仅在中国相当受民众喜爱，就连朝鲜及日本都有来自中国的辽参，可见这三地有着类似的消费文化。究竟东亚地区的人参医学知识与消费观念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有关这方面的医学知识、商业文化与药物间的互动研究，西方学界已有名著可供参考。例如著名性别史学者 Londa Schiebinger 编的 *Colonial Botany: Science, Commerce, and Politic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以及英国医学史家

[1] 关于物质文化的研究取向，可参考 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Polity, 2008, second edition. 关于近来的最新著作，可参考下列作品：[美] 葛凯著，黄振萍译：《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Frank Dikotter, *Exotic Commodities: Modern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Zheng Yangwen, *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Timothy Brook, *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 Bloomsbury Press, 2008；Craig Clunas, *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China, 1368-1644*, Reaktion Books, 2007；余舜德编：《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年。

Harold J. Cook 的 *Matters of Exchange: Commerce,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 两人都关注了药物的流通与商业及医学知识间的相互影响。^[1] 近来“新清史”的研究取向, 无论是罗威廉 (William Rowe) 所说的“内亚转向”还是“欧亚转向”, 这种文化史的方法都提供给我们许多参考的地方。^[2]

第一节 人参政治的研究回顾

目前的人参史研究有两种: 一是传统中医的人参本草学的研究, 主题以人参疗效居多; 另外是清史学者, 大多研究清代的参务政策, 两者几乎没有交集。传统医史的作者大多是不具史学背景的中医研究者, 擅长以现代医学的观点来分析人参的成效^[3]。研究主题涵盖有人参基础理论、栽培、育种、采集加工、植化、药理、临床应用及制剂。^[4] 医史学者探查本草历史的文章不多, 其中以王铁生《中国人参》的《中国人参简史》为代表, 该文对人参的资源分布、应用史、栽培

[1] Londa Schiebinger, Claudia Swan, *Colonial Botany: Science, Commerce, and Politic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2005; Harold J. Cook, *Matters of Exchange: Commerce,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 刘风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美] 罗威廉著, 李仁渊、张达译:《中国最后的帝国》, 台北: 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13 年。

[3] 余云岫:《国产药的文献研究: 沙参、紫参》, 载《新中医药》, 1954 年第 3 期。日册:《东北人参源流初探》, 载《中药材科技》, 1982 年第 5 期。林申凡:《有关人参的历史考证》, 载《中国历史》, 1985 年第 5 期。

[4] 吉林省图书馆编:《人参文献专题目录 (1714—1980)》, 长春: 吉林省图书馆, 1984 年; 王本祥编:《人参的研究》,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年。有关传统医史研究和史学界的医疗史研究的差别, 见余新忠:《从社会到生命: 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 收录于杨念群、黄兴涛、毛丹编:《新史学: 多学科对话的图景》,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第 706—733 页; 王铁生编:《中国人参》, 沈阳: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年, 第 1—53 页; 李艾莲:《人参》,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1 年, 第 1—21 页。